

# 江西地方社会的权势格局与五四运动(1917~1920)

张蓝天

〔摘要〕五四前夕,江西地方社会格局内部的互动博弈相当复杂,形成了各自的运作策略。赣督陈光远需要与地方社会相互借力,取得物资、人际联结方面的支持,而绅商界内部也充满着派系及利益之争。以反对开采城门山铁矿为节点,维护国家和赣人权利的呼声逐渐蔚然成风。在五四运动初期,军商教界都对学生行动给予了一定的支持和帮助,成为运动兴起发展的助力之一,学生的积极行动亦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。随着运动的深入,此前久已存在的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两大议题被赋予了维护国权、公民联合等新的意义,但社会格局中已有的种种裂痕也逐渐浮现,学生界与商界、议会关系恶化,多方围绕自身利益展开角力,相关诉求难以实现,折射出学生现实行动和联合理想的困境。五四大潮也反过来影响了地方社会格局,学生界激烈反抗,国民意识及“赣人自治”观念成为主流,叠加以假该话语为名的各方运作,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江西军政教界的既有权势格局。

〔关键词〕江西;地方社会;五四运动;军绅商学界互动

〔中图分类号〕K261 〔文献标识码〕A 〔文章编号〕1003-708(2022)01-0027-13

五四运动作为一场以北京、上海为中心,扩展至全国、由民众共同参与的爱国运动,其“在地化”的实际情况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。相对于处于运动中心或前沿的京沪、沿海地区,内陆地区五四运动研究仍相对分散<sup>①</sup>。有鉴于此,本文以江西地区五四运动的考察为例,着眼于作为“事件”的五四运动发生、运作及影响等史实的概述与重建,或着眼于个别赣籍人物在运动中的表现与作用,或分析五四运动在地方的后续效应,等等<sup>②</sup>。江西五四运动包含了若干具有地方社会特质之议题,这些议题则内嵌于此前江西社会军绅商学互动的格局之中,值得进一步挖掘。

## 一、五四前江西地方社会格局

作为江西五四运动发生背景之一的权势格局,主要涉及地方政权与南北方政府、地方商会、省议会、教育会、学生界等主体。

1917年陈光远出任江西督军,学界一般认为,其与苏、鄂联结为直系基本势力,此为皖直抗衡之始<sup>③</sup>,并常称陈光远在皖直之争中,不过附和苏督李纯<sup>④</sup>,“李去则赣之陈无能为,惟虑

① 郭若平、徐文彬:《新世纪以来五四运动研究综述》,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9年第4期,第119页。

② 相关研究参见殷丽萍:《五四运动在江西》,《江西社会科学》1993年第6期;李健:《论南昌的五四运动》,《江西社会科学》2000年第1期;曾辉:《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》,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9年第5期;晓农:《五四运动中的“江西三只虎”》,《党史文苑》2006年第13期;齐悦:《段锡朋与五四运动》,《同舟共进》2018年第11期;陈维裕:《五四运动的闯将——罗隆基》,《兰台世界》2006年第23期;于海兵:《革命青年的修身与自治——以〈袁玉冰日记〉为中心》,《学术月刊》2018年第5期;于海兵:《五四时期地方学生的革命之路——以南昌改造社及其团体生活为例》,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20年第6期;刘勉钰、陈立明:《改造社及其革命活动》,《南昌大学学报(人文社会科学版)》1980年第3期。

③ 李剑农:《近百年中国政治史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,第446页。

④ 《当代名人小传》(下),崇文书局1926年版,第76~77页。

其才不足当此要冲”<sup>①</sup>。然而,“长江三督”之间并非了无罅隙。和李纯所执掌的江苏不同,湖北、江西与川湘、闽粤毗邻,堪称处于南北之争的前线阵地,直接面临辖境安全、兵力筹备和粮接济等现实问题。自段祺瑞主持发动湖南战役以来,陈光远对和战的态度一直处于摇摆之中。1917年11月,陈光远尚极力阻止安武军入湘假道<sup>②</sup>,而至12月初,因“南军形势咄咄逼人,再不努力,且牵动本身位置”,一度表现出主战之意,并商倪嗣冲派兵增援<sup>③</sup>。随着岳州形势日益急迫,赣南方面亦传李烈钧准备进攻,其又转向谋和。可见,时局变化中其固有地位能否保存当为影响其态度的直接因素。此外,在南北调和中,其相对于苏、鄂两督,陈光远亦表现出一定自主性。三督之中,陈光远的综合实力相对较弱,弱势实权的角色影响了陈光远在时局中处理中央与地方、地方内部问题上的因应策略。

在所辖兵力上,李纯统中央陆军第六师,兵力共约12000人,此外包括13000人左右的地方军队;王占元所统军队约达55000人,而陈光远所统中央陆军第十二师,兵力仅10000人左右<sup>④</sup>,南北兵戎相见,不仅兵力不敷分配,更有外来者势力坐大的危险。除此之外,在拒绝鲁军取道方面,因皖系主要集矢于苏督,鲁军入长江,必先经过浦口等地,江苏可首先充当“拦路”作用<sup>⑤</sup>,故陈光远也主之甚力。而在2月,李纯最终妥协,鲁军入境,段祺瑞一度欲以张怀芝代陈光远,更让其感到危机重重,转而寻找联合力量。

在财力方面,近代以来,受京汉铁路、江浙沪垄断性地位影响,位于长江流域的江西在近代贸易体系中却相对边缘<sup>⑥</sup>;民国初年,江西地区财政收支体系相对混乱、收不抵支<sup>⑦</sup>,与鄂、苏两省存在不小差距。1918年年初,由陈光远一手提拔的江西财政厅厅长杨庆鋈就称“本省财政困难,已达极点”<sup>⑧</sup>,在应对客军驻扎、募兵援湘等问题上已相当困难,财力之限界又使诸多选择成为某种必然。一方面,为弥补财政困难,军政高层只得频繁选择向日本在九江开办的台湾银行借款<sup>⑨</sup>,陈光远特意赴京运动,亦与需向中央协商款项有关<sup>⑩</sup>,势必向诸方力量谋求转圜,此为张力之一。另一方面,江西为盛产稻米之地,南北战起,各路军米缺乏,纷纷来赣采办军米<sup>⑪</sup>,尚能于财政收入有所补益,而又不能完全置境内客军、民众粮食维持于不顾,尤其涉及到此间商会的态度,则更为复杂微妙,此为张力之二。

1917年12月,皖系安武军为假道借屯,谒见陈光远时,特意向南昌总商会说明秩序问题,请其转知各商<sup>⑫</sup>,足见商会地位之重要。商界首要挂虑者当为市场秩序和贸易利益,其对南北调和一事并无明确态度,1918年3月,鲁军抵达南昌,商会高层态度甚至相当热心<sup>⑬</sup>。然而张怀芝自抵赣后,便积极谋求鲁盐南下分销鄂赣湘三省<sup>⑭</sup>,夺取淮盐销路。对此,地方商界颇为不悛,淮盐公所长陈小梅迭次与榷运局长接洽,并请商会会长龚梅生磋妥办法,以鲁盐运销与淮盐价格相差

① 《致各省督军阳电》,1917年12月8日,《徐树铮电稿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,第3~4页。

② 《南京快信》,《申报》1917年11月24日,第3版。

③ 《陈光远亦主战矣》,《陈督商课安武军防赣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12月4日,第3版。

④ 丁文江:《民国军事纪要》,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,第9~10页。

⑤ 《陈光远辞职声中赣江潮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2月19日,第3版。

⑥ 陈晓鸣:《中心与边缘——九江近代转型的双重变奏(1858-1938)》,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年版,第206页。

⑦ 《江西省志·财政志》,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,第16~17页。

⑧ 《财政厅长定期晋京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1月18日,第6版。

⑨ 《新闻报》1918年11月3日,第3版;《新闻报》1918年12月19日,第2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8年12月23日,第2版。

⑪ 《江西采办军米员来赣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4月27日,第7版。

⑫ 《武汉恐慌中之江西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12月18日,第3版。

⑬ 《张怀芝抵南昌时之见闻》,《新闻报》1918年3月15日,第5版。

⑭ 《江西鲁盐三十票运赣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4月25日,第7版。

过巨、营业亏损不小为由,反对鲁盐入赣<sup>①</sup>,张怀芝输兵销盐之“一举两得计划”遭到挫败。同年秋季,段政府因财政不敷,以印花税抵押借款<sup>②</sup>,在取消印花一事上出尔反尔,激起江西商界普遍反对,省长戚扬恐市面不稳,多次电告院部暂停施行<sup>③</sup>,北京政府则将焦点转至江西印花处长姚深,称受其坚持前令发单、账单勒用印花之蒙蔽。为平息众意,商会领袖罗朗山宣传“不反对政府印花税法,系反对姚深朦部施行勒用印花”<sup>④</sup>,赣籍国会议员李学莲也返乡调查<sup>⑤</sup>,反印花税风潮最终调停了结。在反对鲁盐假道、复征印花税等事件上,江西商界的集体反应,主要与利益相关,但无形中耦合于当时北洋军阀内部直皖之争、反对段政府谋借日款的背景。同年9月,南京商会联合南昌商会致电总统徐世昌,主张息争议和<sup>⑥</sup>,并在陈光远赴京期间,复电北京商会,赞成和平联会<sup>⑦</sup>,与其运动南北调和相呼应。商会通过直接介入南北和议大局,扭结为中央与地方之间一股重要力量。

在人际联结上,陈光远此前长期经营于京津、绥远等地,与江西地方联系甚少。1909年江西省谘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,议员大部分为传统功名拥有者<sup>⑧</sup>。经过辛亥鼎革,李烈钧长赣,南昌临时议会改称省议会,多数席位为国民党议员占据,李烈钧专办江西的系列举措亦引起地方其他势力不满<sup>⑨</sup>。“二次革命”失败后,省议会被解散,不少重要人物如议长任寿祺,副议长颜丙临、欧阳莘,议员魏调元、李儒修、杨赓笙、胡廷銮等遭到通缉<sup>⑩</sup>,同年李纯督赣、戚扬任内务司长,后转为民政长<sup>⑪</sup>,可谓另一次权势转移。戚扬原籍浙江绍兴,光绪己丑科(1889年)进士<sup>⑫</sup>,与清末江西谘议局中黄大坝、叶先圻等老派绅士均有密切交往,长赣几年内也培植了较大势力。

随着1916年省议会复会,各派势力再度复出,绅士集团在传统渊源基础上,开始了新的分合。一批赣籍士绅前往中外新旧势力汇集、为南北所重而自成一特殊区域的上海<sup>⑬</sup>。1917年9月,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,也吸引了一批江西籍绅士南下。这批旅沪、旅粤赣绅大多兼备新学旧知,基本上为早期同盟会会员,曾任职于李烈钧督赣时期的革命政府,担任过首届国会议员,部分为政学会成员,与西南实力派有一定联系。他们纷纷电告“和平”“护法”之意,大多倾向南北调和<sup>⑭</sup>,与陈督态度不无相通之处。此外,陈光远与1918年8月北京政府选出的新国会亦存在密切联系<sup>⑮</sup>,旅京赣籍参众议员基本属安福系、研究系,多为清末致仕,与实业界、教育界联系较广,在地方社会具有较高地位和影响力。与省长戚扬长期在赣,和地方势力的联系根深蒂固不同,陈光远未表现出鲜明的派系倾向,反而能够联结各方力量,斡旋于南北、新旧之间。

① 《江西鲁盐销赣未解决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6月5日,第7版。

② 《财政部与土商之合同》,《申报》1918年9月3日,第6版。

③ 《新闻报》1918年12月22日,第2版。

④ 《赣总商会之特别大会》,《申报》1918年12月19日,第7版。

⑤ 《新闻报》1919年1月26日,第2版。

⑥ 《新闻报》1918年9月27日,第3版。

⑦ 《新闻报》1918年11月2日,第2版。

⑧ 李平亮:《卷入大变局:晚清至民国时期南昌的士绅与地方政治》,经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,第211~212页。

⑨ 金冲及、胡绳武:《辛亥革命史稿》第4卷,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,第1625页。

⑩ 《政府公报》,1913年10月13日。

⑪ 骆宝善、刘路生编:《袁世凯全集》第26卷,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,第186页。

⑫ 《戚扬任赣内务司长之原因及历史》,《时报》1913年9月27日,第7版。

⑬ 《上海特别通讯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11月29日,第3版。

⑭ 《赣议员鼓动陈督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1月18日,第3版;《陈督派任议长赴湘接洽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1月19日,第6版。

⑮ 《江西参议员之递补者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11月13日,第3版。



在此意义上,相对于陈志让提出“军人领导绅士”的政权形态<sup>①</sup>,所谓的“北洋军阀”与地方社会之间也并非畛域分明,以赣督为代表的江西军界实则更深刻地卷入了地方社会的若干互动,乃至相互激荡、互为借力。

但是地方权势主体内部也存在多重分歧。1915年12月,财政部允准九江弛米禁<sup>②</sup>,由于稻米分销内地利润不及出口至外埠,外销成为米商普遍选择。1918年后,随着入境客军增多,针对米粮外运造成本地米价高涨,总商会为回护军政界关系,直接要求米业公会减价<sup>③</sup>,但因外运权限仍操于总会领袖之手,名为减价、实则内部利润不均,由此分歧渐生。所谓“米谷禁运”动议之提出,前期已带有内部互动之复杂背景。

商会内部的权力分配更是争夺激烈。1918年,九江商界领袖级人物舒先庚去世,此后九江商会长长期未能落定,“彼此各怀意见,兹闹不休,会务因之停滞”<sup>④</sup>;而在南昌总商会选举中,巨商龚梅生、卢馥窗通过权势运作继续当选,却将印刷业、皮货业、磨坊业等小行业目为“非正当营业”,乃至不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,引发了不小的风潮<sup>⑤</sup>。江西地区商业主要集聚于南昌、九江,各商帮辐辏,本地外来杂处,处理内部人际、利益关系颇为棘手,商会所能实质性联合的范围亦较为有限。

议会方面,清末民初在开办谘议局、学堂,乃至参与临时议会、军政府等事项上,上述旅京群体与旅沪、旅粤群体不乏交往共事,双方选举纷争并非单纯新旧、党派之别。但结合时局大势、利益博弈来看,不同群体所关联的地方势力在江西省议会内派系之争已表面化。以欧阳莘为代表的合群社,及以叶先圻、宋育德为首的说言社,在议会选举、弹劾省长等问题上针锋相对、分头串联。

自1917年5月始,杨赓笙、欧阳莘、李儒修等合群社省议员,就提出弹劾戚扬省长的动议<sup>⑥</sup>,随即遭到黄衍袁、饶正音等说言社成员的反击<sup>⑦</sup>,赣督对省长候补人选态度摇摆,更为双方角力留下空间,旅居外埠的上层赣绅多直接奔走其中<sup>⑧</sup>。此外,说言社的支持者多兼大股东、且与北京政府有密切联系,不乏资金来源,而合群社的经费则相对窘迫,双方于各项资源争夺甚力,相互攻讦亦早已见诸报端。《大公报》曾载一例颇能说明。前财政厅科员彭勃意图串通合群社议员,将徐干煤矿私下转卖给三井洋行,但惧于实行,而被买通的议员坦然称:“正义报(引者注:该报由说言社主持)与吾党平素反对,无人不知,只需在吾党报纸鼓吹鼓吹,人家就知道此事纯属党派关系,不肯信他”<sup>⑨</sup>,足见议会内部之争已广为世人所知。1918年5月,第一届江西地方省议会期满闭会,此后议会选举更是乱象迭生,数月间全武行频频上演。“民官两系,相争甚烈,各去票费八万余……争斗几至流血,结果仍一哄而散,势非伤人闹至法庭,空无结果”<sup>⑩</sup>,最终合群社龙钦海赢得正义长职位,副议长胡廷奎、饶正音则分别由双方产生,暂时达成某种妥协,但是议会种种腐败现象无疑使其声誉大为跌落。

① 陈志让:《军绅政权: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》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,第5页。

② 《九江准弛米禁之部电》,《新闻报》1915年12月12日,第5版。

③ 《江西禁止米谷出口之提议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3月21日,第7版。

④ 《地方通信:九江》,《申报》1920年12月27日,第7版。

⑤ 《南昌总商会改选黑幕》,《时报》1918年4月3日,第6版。

⑥ 《赣省会弹劾戚省长之风潮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10日,第6版。

⑦ 《赣省又有违法之议案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16日,第6版。

⑧ 《赣省长运动挽留之黑幕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7月29日,第6版。

⑨ 《赣省议员卖矿记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27日,第6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8年10月1日,第2版。

教育界方面,李烈钧组建军政府后,任命宋育德为教育司司长,宋从此在江西地方教育中发挥着重要影响。从1916年宋育德主持的教育会来看,该会基本上集合了大量本地教育精英,如罗家衡、程时焯、欧阳祖经等留日人士,心远中学校长熊育锡、赣省中学教员吴大樽等江西地方新学从业者<sup>①</sup>。宋育德本人在文教界的交际也相当广泛,其与张元济、蔡元培等人均有往来,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风气开通。九江成为商务印书馆较早设立分局的地方<sup>②</sup>,该馆刊布书籍成为当时江西青年学生主要阅读来源之一<sup>③</sup>。熊育锡还曾函告在北大就读的赣籍学生苏芬,请其联系宋育德,以与蔡元培、胡适接洽<sup>④</sup>,足证宋影响力之大。

然而宋育德长期把持的教育界,早已引起不少诟病。1916年袁世凯汲汲谋求称帝时,宋育德曾贸然取全体学界名义递交劝进表,为众人所不齿。且在教育会内部,其日益倾向于培养个人派系势力,拒绝新会员加入、不承认民国二年之旧会员,依托《正义报》为言论机关<sup>⑤</sup>,实则与上述说言社势力互为帮衬。1918年,宋育德与教育会中梅士煥、程臻、邱珍共同遴选为旅京安福国会议员,罗家衡、程时焯、欧阳祖经等原同盟会人士退出。派系与政争因素的加入,使原本颇有进步色彩的教育会带上了若干不稳定的因素。

1917年11月,许寿裳转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,其引入若干江浙系人士担任教育厅要职,同时邀请程时焯、匡文涛等学问根底深厚、思想趋新的人物加入<sup>⑥</sup>。但自其组建人事始,就受到了传统教育界势力的干预。《申报》称“(许寿裳)到任以前颇有认真办事之意,诎到赣后为某方面势力所压迫,失其自由活动之本愿,……第三科长王经畬,于教育界资望尚浅,……诎某当道闻王系科员,临时请许前往,将名单更换,王为科长,匡为科员,发表后舆论大哗,省城各报无不大肆抨击”<sup>⑦</sup>。作为妥协,许寿裳调曾担任教育会调查干事的王经畬担任第三科科长,但若干纷争并未解决,并与此后五四运动中教育会和教育厅之沉浮相关。

## 二、运动兴起发展的助力因素

已有论者指出,近代以来传媒、社团等对于江西五四运动的推动作用<sup>⑧</sup>,学生群体在集体情感和团体组织的引领下,率先走上街头,成为参与五四运动的先锋队伍。但在江西地区,其与上述若干权势主体的互动同样值得注意,后者在某些方面亦成为运动兴起发展的助力因素。

五四运动前夕,以反对开采城门山铁矿一事为重要节点,维护国家和赣人权利的呼声蔚然成风。虽然各权势主体内部暗流涌动,但在时局变化中,利益博弈与话语嬗变并存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九江城门山铁矿原在清末被盛宣怀购作私产,李烈钧督赣时被购归,但因赣宁战役发生而中断开采。1919年1月,由王揖唐领衔,联合赣籍参议院议长李盛铎、众议院议员饶孟任及其他皖系、安福系人士,申请领办仙居公司开采城门山铁矿,得到了江西实业厅厅长、贵州籍人士夏

① 《江西省教育会民国五年职员一览表》,《江西教育杂志》1916年第5期,第135~140页。

② 《张元济日记》上册,1917年3月24日,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,第193页。

③ 如袁玉冰在日记中,就多次记载自己前往商务印书馆购书,并购买阅读该馆出版之书籍。参见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 (原名《中华民国八年学校日记》,北京大学藏), 1919年9月17日、9月21日。

④ 高平叔: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第2卷,1920年6月12日,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。

⑤ 《江西教育界之大风潮》,《时报》1917年3月15日,第6版。

⑥ 《江西教育厅呈送该厅职员名单履历册请核备文》,《教育公报》1918年第5卷第3期,第145~147页。

⑦ 《赣省实教两厅之新声》,《申报》1917年11月24日,第6页。

⑧ 曾辉:《关于江西五四爱国运动若干问题再探讨》,《中共党史研究》2019年第5期。

同龢的批准<sup>①</sup>。消息传来后,顿时掀起轩然大波,以陈祖怡、黄为柏为代表的议员,开始在省议会积极活动,促使省议会电告北京政府农商部,反对李盛铎开采<sup>②</sup>。结合当时背景看,该铁矿的开采实则涉及两层关系,一方面,因铁矿属省有产业,北京政府能否变相收归国有,乃至抵押日款,涉及到中央与地方、外交与国权问题;另一方面,因联名申请者多为皖系人物,又涉及到皖系与其他势力之争,适逢在上海召开的南北和议进入胶着阶段,使相关问题愈加微妙复杂。

3月21日,省议会致电粤军政府李参谋长暨同乡诸人,北京张绍轩(即张勋)暨同乡诸人,呼吁共同维护赣人权益<sup>③</sup>。29日,以汤漪、汤祚贤等为代表的江西旅沪同乡会电呈北方代表朱启铃,将希图采办铁矿者指为“主战派之首领”,而“此案不特为地方矿权所关、且为和战问题所系”,与皖系此前参战借款、八年公债、凤凰山借款等案相挂钩<sup>④</sup>,直击皖系痛处,将铁矿问题转化为南北和战之争,并在民族主义立场上占据道德高地。南方主战派领导人李烈钧也公开通电要求保矿<sup>⑤</sup>,旅粤赣绅甚至称“城门铁矿案争若无效,定请军府派兵来护,以为后盾”<sup>⑥</sup>,态度更为强硬。然而北京政府农商部仍坚持认定办矿于法律及国权均无不合,要求实业厅速发矿照缴京<sup>⑦</sup>,愈发激起省议会中活跃者的反对。

在此次事件中,主张维护赣人利益的群体占据了较多的社会资本和话语资本,凡被认为有碍矿权者均经历了一定的道德危机。如龙钦海、胡廷銮、饶正音三议长被指有入股仙居公司之嫌,在其他议员质疑下,不得不“表明心迹,焚香盟誓”,难掩忸怩之态<sup>⑧</sup>。在查办实业厅长夏同龢、质问威扬交还矿照问题上,说言社议员因阻挠相关动议<sup>⑨</sup>,为各界所不容,不得不另发起保矿会以抵制<sup>⑩</sup>。虽然相关主体内部的裂痕依然存在,但是派系、利益之争已然与话语、道德站位交织在一起,在时代大潮冲击下,后者之重要性愈发凸显,与五四逻辑相互承接。

五四运动初期,学生首先联合商会,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,商会在若干活动中表现得较为强势,广大商民更是积极响应。5月6日,北京学生罢课消息传到九江,九江各学校联名致电政府,声援北京学生,九江总商会也同时致电“乞速电欧会代表抗争,为国家争生存,为人民免奴隶”<sup>⑪</sup>。此后,学界与商界的联系愈加紧密。

一方面,罢市、抵货主张的实际施行需要商会的支持,因此,学生代表相当重视对商会的宣传与联络工作。23日,九江南伟烈学校及其他各高校学生均派代表赴商会协商,次日,九江绅商学界召开秘密会议,学生代表慷慨陈词,希望商会“毅力主持”<sup>⑫</sup>。在举国风潮中,大部分基层商民不乏公益心与爱国情感。6月12日,除商会副会长辜葆城所开商店及七八家钱业店铺不肯关闭外,大部分商店坚持罢市<sup>⑬</sup>,学生则组队维持秩序,起到了较好的配合作用。两日后,九江和上海取同一节奏预备开市,引发部分街头苦力工人的不满,学生亦在劝解双方、平息冲突中所为

① 《王揖唐等为领办仙居铁矿呈》,1919年1月22日,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: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·工矿业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第583~585页。

② 《新闻报》1919年3月5日,第2版。

③ 《新闻报》1919年3月21日,第2版。

④ 《江西旅沪同乡会公呈》,1919年3月29日,《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》,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,第209页。

⑤ 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3日,第3版。

⑥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20日,第3版。

⑦ 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5日,第3版。

⑧ 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3日,第3版。

⑨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8日,第3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17日,第3版。

⑪ 中共九江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:《中共九江市党史大事记:1919-1949》,1994年,第1~2页。

⑫ 《浔绅商学界之对外会议》,《申报》1919年5月24日,第8页。

⑬ 《九江罢市风潮详情》,《时报》1919年6月19日,第1版。



甚力<sup>①</sup>。这一过程中,青年学生的行动力和良好形象得以显现,时《申报》称誉道:“不论聚集多人,只要学生一言,无不立散,即八九岁小学生,人民必信仰”<sup>②</sup>。在江西修水县,返乡学生也通过热情宣传和真诚行动,使地方绅商人士深受感染,商会领袖当即表示对不再贩售日货的提议极为赞同<sup>③</sup>。南昌地区,在学生演讲、传单宣传的影响下,钱业若干商民自发出资翻印“中国学生团所发表之二十一条中日密约共万余份,邮寄各属及各乡村,俾人人得知国家状况危亡,以力图自救”<sup>④</sup>,进一步提升到思想自觉层面。

另一方面,在反对议员加薪一事上,商界的加入明显增强了学生行动的力量。5月26日,省议会开会议决议员加薪一倍<sup>⑤</sup>,实为省长戚扬袒护之结果<sup>⑥</sup>。消息传至学生群体中,顿时引起轩然大波。江西由于地处内地,思潮文化与京沪等发达地区存在一定位差,梁启超的国民思想和王阳明的修身传统在青年学生中有着深远影响。以袁玉冰为例,其更关注五四之内面——即卖国贼人格不修所致危害,在此背景中,闻及议员加薪,更增添其对于国民性、人格修养之怀疑与失望,其言“阅报见民报大多皆系省议会加薪事,而中庸报未见只字,且往报且为议会辩护,彼二报之价值可知矣。天下最丧心病狂、利令智昏,孰有过于本江西之省议员乎”<sup>⑦</sup>,可一窥当时青年学生之心态。因此,在加薪内幕被揭露后,学生表现得颇为激动,5月30、31日,学生赴议会要求与议长交涉受阻,于是大起忿激,部分学生强行入内打伤议员、打破器物<sup>⑧</sup>,与议会的矛盾迅速激化。而当学生与商会代表结队共赴督军署时,却得到了督军陈光远的重视,其表示可“顺应民意、解散议会”<sup>⑨</sup>。随后,九江总商会、教育会也联合发电反对议员加薪<sup>⑩</sup>,很大程度上扩大了运动的影响力。

在部分事项上,学界表现出对商界的依靠,似助长了商界自恃之意。如在磋商联合办理国货维持会时,学生表示“力多求商会多负责任,务期达到目的,无论应如何进行,均惟商会是听”<sup>⑪</sup>,部分商界领袖甚至直接提议该会应以“商界”冠名<sup>⑫</sup>,为此小起纷争。但总体上在运动初期,商会给予的支持应得到肯定。

此外,作为地方实权人物的江西督军陈光远,在运动初期对学生行动较为宽容,给予运动以一定的空间。尽管维持秩序仍是其第一考量,但在蓬勃发展的学潮中,其基本上顺应大局,尽量避免与学生直接发生正面冲突。5月14日,军民两长电告府院“学生愤慨情形”<sup>⑬</sup>,此后,进一步转呈江西学生的爱国情感<sup>⑭</sup>,以示地方之民气。九江罢市过程中,受军政界指示,军警在维持秩序之外并未干涉相关活动<sup>⑮</sup>,使运动初期学生与商民的爱国抵货行动得以顺利进行。值得注意的是,赣督表态也与时局中的诉求相缠绕,曲折地作用于地方运动的发展上。同时期,陈光远与

① 《九江强迫开市之风潮》,《新闻报》1919年6月19日,第1版。

② 《九江罢市之商讯》,《申报》1919年6月18日,第8页。

③ 《赣属学生两大会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7月13日,第6版。

④ 《赣人爱国热力之耐久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8月22日,第6版。

⑤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28日,第4版。

⑥ 《赣省长与省议会之活剧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6月18日,第6版。

⑦ 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1919年5月29日。

⑧ 《南昌学生反对省议员加薪》,《新闻报》,1919年5月30日;《各校学生之坚决》,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31日。

⑨ 《各校学生之坚决》,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31日。

⑩ 《九江近事》,《申报》1919年6月2日,第8页。

⑪ 《赣省商学两界之联合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7月15日,第6版。

⑫ 《江西国货维持会成立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7月19日,第6版。

⑬ 《新闻报》1919年5月14日,第3版。

⑭ 《新闻报》1919年6月10日,第3版。

⑮ 《九江罢市之商讯》,《申报》1919年6月18日,第8页。

苏督李纯措意许久的南北和谈陷入僵局,因此,其一面敲打段系“外交吃紧”的困局,一面表示解决外事,首先应致力于国内和议,方能于“民本”“民心”有所裨益。与此同时,旅沪赣籍士绅罗家衡等亦与之同声相应,电告全国反对北京政府向旧银团借巨款及在巴黎和约上签字<sup>①</sup>,直接助推了五四运动的声浪。

地方教育精英组成的教育会作为社会团体,在相关问题上的处置更为裕如,不仅多次借给学生联合会开会场地<sup>②</sup>,且在不少议题上对学生界有所声援。在运动风潮中,不少中小学校长及教员对于学生行动也相对宽容,如就读于南昌省立二中的袁玉冰即记载,该校老师们多与学生谈及国事,宣传使用国货、痛诋军阀黑暗<sup>③</sup>,在学生力持罢课时,除口头多加劝说外,亦未与学生产生激烈冲突<sup>④</sup>,这些进步教员的思想倾向,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学生运动的发展。

相对于湖北、浙江等在五四期间直接发生流血冲突地区,江西五四运动的整体形式颇为完备、参与群体广泛,运动的环境相对宽松,与这些潜在的助力因素不无联系。江西多地进行了罢课、罢市活动,九江地区还有工人罢工的支援。结合袁玉冰的日记来看,当时在南昌地区,各校学生互相联络、利用公共空间开会议事等行动均相对自由,学生游行亦多次诉诸地方权势主体<sup>⑤</sup>,对之抱有一定的期待。

### 三、运动深入:围绕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的多方角力

但与此同时,此前社会格局中已有的种种裂痕逐渐浮现,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两大议题既鲜明地体现了江西五四运动的地方性,却也折射出学生行动的影响与困境。

上文所述,米谷禁运本与商会内部多重矛盾有关,而在五四运动大潮中,禁止江西米谷出口,以阻止“转售东洋、接济口粮”<sup>⑥</sup>,势必转化为地方五四关注的议题之一,且尤为青年学界关注。

此前在罢市问题上,商界领袖如九江商会副会长辜竹平、南昌商会会长龚梅生及部分大会董,就多持排斥态度,与众多商民情感、学界诉求相对立。6月28日,九江首先实行米谷禁运,然而成效并不理想,此后一直处于“似禁非禁”的状态。辜竹平本人即兼营米粮贩卖,其仍可依托个人权势私自出口,不少资本雄厚的米商也可通过疏通关系,继续贩运。正如《申报》的点评一针见血:“禁米之后,小本经纪当然不能贩运,其强有力之米商既有操纵之权仍可乘机偷运垄断利权,如价稍平又可以便宜收进”,同时偷运还能省去捐输负担<sup>⑦</sup>,愈发造成利害不均。

此举引起主要由中小米商组成的米业公会的不满,8月14日,该会函致学生联合会,请其与商会接洽、停止代运,同时检查米船、罚办充公<sup>⑧</sup>,折射出其对于五四运动中、作为一股颇有生机力量的学生行动的期待。学生联合会随即多次派代表与商会接洽,表示山东问题未解决,主张开禁接济东洋,于国权上不合;军阀战乱、民生凋敝之时,开禁更造成米价高涨、民食不敷<sup>⑨</sup>。

① 《众议院公报》1919年第9期,第69~70页;《众议院公报》1919年第11期,第61页。

② 《九江学生会议纪事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7月2日,第6版;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1919年6月5日、11月16日。

③ 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1919年5月15日、1919年12月28日。

④ 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1919年12月15日。

⑤ 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1919年5月8日、5月10日、5月12日、6月8日。

⑥ 《赣各界驳斥弛米禁说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11月21日,第6版。

⑦ 《九江贩商禁米之内幕》,《申报》1919年8月12日,第7页。

⑧ 《米业呼助学生》,《新闻报》1919年8月14日,第6版。

⑨ 《奸商运动开米禁之失败》,《晨报》1919年11月7日,第3版。



在痛陈道理外,学生界还组织游行演说团,散发白话传单,向工商界宣传米禁与民生的重要关联<sup>①</sup>,并在此后组织了几次联合游行,以实际行动表示抗议<sup>②</sup>。

在此之后,学生界与上层商绅的关系迅速恶化。9月15日,南昌学生联合会为响应京津沪各界联合会之要求,拟组织江西省各界联合会,却遭到南昌总商会的消极反抗。商会在入会问题上几经反复,以发泄对学生此前捣毁日货、米谷禁运之不满。其害怕学生势力藉联合会之成立“日益膨胀”,因而准备“乘此时表示不赞成,减学生之锐气”。针对商会之态度,大会最终议决其加入与否本无足轻重<sup>③</sup>,等于双方矛盾已直接公开化。

地方上层商绅之强势,背后亦与军民两长态度有关。自陈光远督赣以来,财政恐慌就已成为日益紧迫的问题,1919年上半年仅能依靠“地丁及茶木米粮等出口之厘税得以临时敷衍”<sup>④</sup>,米粮出口攸关财税收入,一旦取消,造成的财政压力可想而知,故其对于开放米禁实际抱有支持态度。在接见学界代表时,军民两长及财政厅往往措辞含糊,并未实际采取措施之本意。如财政厅宣传所谓“三年弛禁方法”,主张监控米价、抽税调节、划分地段,方案看似复杂庞大,却难有实现之可能<sup>⑤</sup>。督军陈光远曾一度以保障民生及反对资助战争为由,表示将继续维持米禁<sup>⑥</sup>,此后,却也做“以退为进”之举,表示赣米出口后之具体情况官厅亦难以知晓,“最好请学生代官厅帮忙”,“如查得赣米出口后,有在何处、卖与某国情事,即请该地学生联合会告赣”<sup>⑦</sup>,显然也不切实。面对米商运动弛禁与学生坚决主张严禁之间斗争日益尖锐,官厅即已采取一种骑墙态度,甚至宣布“对米禁无成见,唯以真正舆论为标准”,诸多米商即不惜收买报纸、学生,不过给金钱运动以更大空间<sup>⑧</sup>。

学生界激烈反对议员加薪事件后,议会与学生界“恶感极深”<sup>⑨</sup>,在诸多问题上已有争执。其卷入米谷禁运的直接原因,则在于该事又挑动了其内部派系争夺这一敏感神经。11月22日,各方代表在省议会讨论米谷禁运善后问题,该会达成“如米价涨至十一千,即由会咨请禁止”之意见,实则学生已做出很大让步,而议论时,“合群、说言互为诋毁,来宾大笑”,现场实在不堪<sup>⑩</sup>。合群社议员中不乏关注学潮民食者,其首先试图介入调和,然而由于说言社代表副议长饶正音一再推诿,调停会亦一拖再拖,此后的会议上,主张与官厅互商救济方法的合群社议员黄用中、谢鸿藻、陈祖怡等,与说言社黄辉、葛第春再度针锋相对<sup>⑪</sup>。由于大力运动弛禁的出口米商以抚州浒湾居多<sup>⑫</sup>,而饶正音本人亦为抚州人,其在会后不仅毫无行动,且宣称:“我是抚州人,抚州是产米的地方,我若不主张开禁,何以为地方代表呢?”<sup>⑬</sup>至此,米谷禁运动议已几乎落空。翌年4月,在米价超过此前议定价格时,学生会代表再赴议会要求按约定颁发禁令,其不过推诿而已<sup>⑭</sup>。随着赣南方面李烈钧军队进攻日迫、皖直关系愈发不稳,更加上本省军饷困难,6月29

① 《赣各界反对开米禁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11月18日,第7版。

② 《赣人反对弛禁之大游行》,《申报》1919年11月28日,第7页;《赣省米谷弛禁斗争尖锐》,《晨报》1919年12月2日。

③ 《赣人决组各界联合会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9月15日,第6版。

④ 《赣省之经济恐慌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10日,第6版。

⑤ 《江西各界代表之米禁谈话》,《申报》1919年11月22日,第7页。

⑥ 《陈光远维持米禁》,《民国日报》1919年11月12日,第6版。

⑦ 《陈赣督平息学潮之政见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12月27日,第6版。

⑧ 《赣省米谷弛禁斗争尖锐》,《晨报》1919年12月2日。

⑨ 《时报》1919年7月10日,第3版。

⑩ 《新闻报》1919年11月24日,第3版。

⑪ 《陈赣督平息学潮之政见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12月27日,第6版。

⑫ 《米谷开禁所闻》,《新闻报》1919年10月30日,第6版。

⑬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:《五四运动在江西》,1989年版,第138页。

⑭ 《赣米涨价将重申禁令》,《新闻报》1920年4月6日,第5版。

日,督军陈光远绕开议会、直接提交财政厅布告米谷弛禁<sup>①</sup>,各方争执一年之久的米谷禁运事告一段落。

五四期间,旅居外埠的上层士绅同样通过各种途径介入进来,使得本地学生与政界争持不下的若干议题更为复杂。以学生界亦热心投身的救济南浔铁路一事为典型。自清末江西京官李盛铎主张修筑南浔铁路以来,由于规划不善、效益不高且路政败坏,该路早已负债累累,本属历史疑难问题。1918年日本以催缴该路债款为由,汲汲谋取该路管理权,并准备进一步将路线推广至闽粤两省<sup>②</sup>。为弥补资金缺口,两年间,李盛铎频繁向日本台湾银行及英美资本借款<sup>③</sup>,相关举措早已引起地方社会不满。1919年5月,南昌地方报纸再次披露南浔铁路左支右绌的财务状况,台湾银行亦不同意南浔铁路公司将未能偿付的息金转为新债,扬言若不立即清偿,“则把这条铁路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”<sup>④</sup>。五四前夕,李盛铎卖城门山铁矿一事本已引起不小风潮,旧浪新潮叠加,救路维权更成为江西地方五四运动中普遍呼声。

6月3日,九江总商会分函总商会、股东会,指出“时机危迫、再难延迟”,更应合谋补救<sup>⑤</sup>。与此同时,九江学生界联合社会其他各界讨论救路问题,但会议上,众人多无何以实际措置的头绪,刘黛青等女教师不禁认为,“兹事重大,似非我们人民所可办到,应呈请督军省长力予维持,以利进行”,相对而言,学生界代表则颇为坚定,指出“此种责任系在人民,若人民不能自立,官厅亦岂能为力”,但在具体方案方面,其主要设想依托人民的自觉心募集筹款<sup>⑥</sup>,这对于巨额债款而言似属杯水车薪,但是“人民”作为一个整体话语的提出,明显带有着五四时期独特的进步意义。7月24日,由军绅商学各界代表组成的江西省救济南浔铁路会召开,可谓是五四时期江西地区一次空前的大联合,该会以唤醒赣人集体自觉为标旨,点出南浔铁路与江西全省、东南各省乃至全国的紧密联系<sup>⑦</sup>,表现出从学生界传递至社会整体的“大联合”精神。

然而在此后商议具体救助方法时,各方主张分歧,而核心问题仍难以解决。由社会各界组成的南浔铁路救济会主张通过发行储蓄有奖证券集资<sup>⑧</sup>,但其成员中有不少基督教界人士,以该奖券性质类似赌博,而不甚赞同<sup>⑨</sup>,且该券因带有获利性质,与其他省份部准发行的慈善票券不同,北京政府方面又需疏通<sup>⑩</sup>,更增添一重困难。在集资救路思路外,部分旅沪、旅粤赣绅却认为,借款一事十余年来已无底限,根本解决应在于整理路政,包括公债拆折、股权重组<sup>⑪</sup>,而这就触及到旧有股东的核心利益,且大股东如吴钊、黄大坝、闵荷生,多为安福国会中保守派巨绅,其与主张整理路政甚力的代表如谢远涵,本扞格不入,此皆为张力所在。

与此同时,由淮盐公所陈小梅牵头,以商会为主体发起了“卖米救路讨论会”,设想在沪市米价上涨时卖米集资,然而商会在米谷禁运与弛禁之争炽热之时提出这项动议,本身就是与学界博弈的反映,在讨论会上,不少参与者亦态度消极,不仅怀疑卖米利润根本不符合预估,且与学

① 《赣省米谷弛禁已实行矣》,《申报》1920年6月29日,第7页。

② 《赣浔路权与借款》,《大公报》1918年12月23日,第3版。

③ 《新闻报》1919年1月26日,第2版;《新闻报》1919年4月20日,第3版。

④ 《寇克报告》1919年5月,《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(1912-1949)》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,第323页。

⑤ 《九江近事纪要》,《时报》1919年6月3日,第6版。

⑥ 《南昌妇幼医院之大会》,《时报》1919年6月16日,第6版。

⑦ 《赣省救济浔路之大会》,《申报》1919年7月24日,第7页。

⑧ 《南浔铁路救济会忠告股东书》,1919年9月,《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(1912-1949)》,第559页。

⑨ 《信徒不以赌博兴公益》,《兴华》1919年第16卷第36期,第15页。

⑩ 《救济浔路之一夕话》,《申报》1920年2月27日,第8页。

⑪ 《南浔铁路根本改良计划》,1919年12月1~2日,《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(1912-1949)》,第558页。

界闹出大风潮时,还须“先疏通学生联合会,然后方可进行”<sup>①</sup>,既反映出学生界已被正视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,但也说明商会这一救济方案于情理上更有颇多困难。从该事直接关涉的主体来看,北京政府交通部也深知该路积弊深重,不愿接受;李盛铎擅自借款,本不合法、其分配运作更内幕重重;股东会巨绅不仅利益攸关,对地方社会自行运作种种联合会涉足路政,更心怀不满,乃至宣称不承认九江联合会<sup>②</sup>。无怪乎时人在报端评论,在救济南浔铁路问题上,“察赣人心理,大抵各怀主张,不能合力齐心,故议论多而成功少”<sup>③</sup>,相关问题之激荡仍在继续。

#### 四、潮起潮落:运动中的权势嬗变

历史主体既是“剧作者”又是“剧中人”。由上文可见,江西地方社会深刻地卷入了五四运动的各项议题之中,五四大潮亦对相关权势主体的地位嬗变产生一定影响。

清末以来地方自治就成为民间吁求之一,但这种“自治”尚且与“官治”色彩相交织<sup>④</sup>。从江西地方社会的情况来看,五四运动的兴起发展催生了国民身份意识上的“自治”观念,并落脚于地方自治和个体自治之上。一方面,在罢市抵货、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等议题上,维护家乡权益与维护国家权益的意义被打通,社会各阶层以地缘观念为基础或多或少进行过一定的合作。另一方面,“赣人”也成为集体行动的话语和被诉求的对象,各方均以代表“赣人利益”自任,分别串联旅居各地的同乡团体,“赣人治赣”成为笼罩式话语,亦在不同语境中被赋予了相异内涵。

省长戚扬的地位沉浮即与之相联。省议会内部派系分化由来已久,此前反对势力为引入同调,弹劾省长之声早已出现<sup>⑤</sup>,戚扬也针锋相对,公开数落“自治”所谓种种流弊<sup>⑥</sup>。而在五四期间,戚扬因交还矿照、袒护议会加薪,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不仅学生反对议员加薪运动热情高涨,而且地方实力派绅商以“赣人治赣”为由,既主张排戚,又要求抵制由北京政府选派、与地方无甚联系的丁乃扬<sup>⑦</sup>,议员却也因事发后戚不予保护而集体移恨之<sup>⑧</sup>。派系对立、利益争夺与道义指责叠加在一起。面对民气高涨的形势,赣督陈光远对于慰留其同僚亦不积极<sup>⑨</sup>,一时间省长戚扬的地位岌岌可危。

但在1919年八九月间,国民党系军事领袖李烈钧再次图赣,陆续派遣远征军到达赣南附近<sup>⑩</sup>,江西地区南北对峙的军事形势再度紧张,李烈钧亦以“赣人治赣”为由,反对直隶出身的陈光远<sup>⑪</sup>,更增添其危机感。

为防止两种呼吁“自治”的话语合流,陈光远对学生运动及排戚动议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。9月25日,因民系主持的《匡报》披露陈光远赞成安福系头领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一事,陈光远便对相关报纸衔恨在心,要求取缔报纸、管控言论<sup>⑫</sup>。学生因受闽案刺激再度游行,呼吁解决其

① 《赣垣卖米救路讨论会》,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1月23日,第7版。

② 《时报》1920年12月10日。

③ 《五四运动在江西》,第157页。

④ 颜军:《“自治”与“官治”: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》,《广东社会科学》2014年第6期。

⑤ 《赣省会弹劾戚省长之风潮》,《大公报》1917年5月10日,第6版。

⑥ 《赣省长之自治意见》,《申报》1917年5月5日,第6页。

⑦ 《赣省长运动挽留之黑幕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7月29日,第6版。

⑧ 《戚扬恋栈之暗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17日,第6版。

⑨ 《赣省长与省议会之活剧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6月18日,第6版。

⑩ 《时报》1919年8月28日,第3版。

⑪ 《赣南形势紧急之续报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7日,第3版。

⑫ 《陈光远取缔报纸》,《时报》1919年9月25日,第5版。



一直诉求的米禁、浔路等相关议题,陈光远决定采取强制措施。12月14日,其要求警厅封闭学生会,造成学生群情激奋、集体罢课<sup>①</sup>,江西地方五四运动的空间暂时收紧。

此外,伴随北洋军阀内部的裂痕愈发凸显,段系主持的北京政府试图更动陈光远职位,更让其对戚扬抱有“同病相怜”之感,陈在试图维持自身权势之外,亦尽力为戚扬说项<sup>②</sup>。1920年始,部分旅京赣籍安福巨绅如李盛铎、蔡儒楷、吴钊等,却也以“赣人治赣”为名暗中运动,希冀谋得省长一职,无疑与江西军民两长相水火。陈光远不仅严厉压制当地报纸,对地方士绅也疑窦丛生。报载其与一士绅与谈,后者不得着意解释“京沪各处之政客辈,侨居省外,既无财产之牵连,复有党派之关系,所以提倡自治,希图个人活动,若我等则安处家乡,久托庇督帅之下,不特不赞成自治”<sup>③</sup>,可见地方社会环境整体上的紧张状态。

经过五四运动的大潮,江西军政首长陈光远、戚扬虽然维持了自己的位置,但是由于五四所引发的国民情绪、自治诉求为各方所运用,根本上侵损了其权势地位,其逐渐转向与学生、士绅疏离乃至对立的态度,人际联结、地方资源等方面均受削弱,此时可谓已种下权势陨落的种子。1921年,戚扬被迫离任,一年后,陈光远最终也因难抵南军进攻而去职。

五四期间,以许寿裳为代表的教育厅却直接经历了最大的沉降。许本人曾为留日学生,在日期间加入光复会,与鲁迅、蔡元培等北京学界交往甚密。其本人此时对于新文化并未呈现出很浓厚的兴趣,周作人曾在回忆录中记载,当鲁迅拿几册《新青年》见示时,许却认为“这里边颇有些谬论,可以一驳”,仍以“民报社时代的眼光”看待<sup>④</sup>。可见,许寿裳主张甚力的民治主义,与新文化运动的追求仍有一定距离,这可作为观察其在地方五四运动发生时心态的一条线索。

教育厅联结官学两界,在处置罢课游行等问题上常处维稳与尊重民气的两难之间,层层压力被转嫁过来。京沪地区学生运动消息刚一传来,江西地区学生界便积极响应,但许寿裳不得不出头要求各校校长提高警惕,禁阻学生游行,并提前组织考试放假<sup>⑤</sup>,直接与诸多激进学生的情绪相抵牾。此外,由于财政困难,南昌地区教员的下半经费一直被拖欠<sup>⑥</sup>,亦对教育厅感到不满。由此可见,学生、教员双方与教育厅间存在一定的裂痕。

同样,围绕着教育长及地方教育权力分配,“赣人教赣”的提法占据了较大的话语权,地方上反对教育厅的群体纷纷以之为武器。“自治”理念由地方延伸到教育界,不仅是整体社会思潮逻辑发展的必然,而且也是与京沪地区先进思潮联动的结果。其时北京学生联合会与教育部的颀颀对抗臻于白热化,其所宣传的“教育自决”传播到江西地区学生群体之中<sup>⑦</sup>,愈发引起学生界共鸣。北京学生会还声援江西学界,批评江西教育当局对学生会被摧残、教员无法维持生计的现状不闻不问<sup>⑧</sup>。

但是,相关话语的运用也夹杂了其他目的。因议会加薪、学生游行捣毁议会,省议会已积恨于教育界,要求省长惩办学生、撤换校长,而许力持不可,双方产生激烈冲突,厅长许寿裳、科长程时焯曾一度提出辞职申请<sup>⑨</sup>。而拥护省长之说言社与宋育德主持的教育会互为表里,其力主

① 《陈光远封闭学生会》,《时报》1919年12月14日,第6版。

② 《南昌特别通信》,《时报》1920年4月24日,第5版。

③ 《赣督不准赣人之鼓吹自治》,《新闻报》1920年10月30日,第6版。

④ 周作人:《知堂回想录》,群众出版社1999年版,第300页。

⑤ 《新闻报》,1919年5月12日;《新闻报》1919年6月6日;《九江罢市之经过》,《申报》1919年6月16日,第8页。

⑥ 《赣省之经济恐慌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9月10日,第6版;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1919年12月2日。

⑦ 《袁玉冰日记》(手稿),1919年12月27日。

⑧ 《北京学界之新潮流》,《大公报》1919年12月20日,第6版。

⑨ 《江西政界之暗潮》,《申报》1919年7月4日,第7页。

“赣人教赣”，实际上更指向排斥许寿裳，代替以赣籍人物、扩张自己势力的目的<sup>①</sup>。

1920年5月，江西学生联合会响应上海学生总会的呼吁，罢课达一周之久，与教育厅复课要求产生龃龉<sup>②</sup>，在督军省长的压力下，10名学生被开除，教育厅长许寿裳顿时成为学生群体攻击的焦点。江西学界公开通电质问教育厅长，指责其整顿江西教育不力、阻挠罢课、开除学生，与其自身所持“德谟克拉西主义”相背离，不啻以“强权压服公理”<sup>③</sup>。省议会、商会也纷纷运动，谋求转圜，称“为学生力主公道”<sup>④</sup>，以博得社会声誉，许寿裳的社会处境已相当艰难。

许寿裳本为新派人物，但在五四期间，其并未顺应学生情感主动而为，且在多重因素限制下难以施展，以至于以消极角色存在于江西五四运动中，最终不得已于同年年底去职<sup>⑤</sup>。不过，本应富有民主进步色彩的“赣人自治”提法也日趋形式化，江西地区各权势主体的人事变动依旧一波三折。

## 五、结语

邓野曾指出，五四运动不单纯是一次“下层学运”，而是“既是学潮、又是政争”的政治运动<sup>⑥</sup>，落脚到相对基层的地方社会，同样需要考察该地既有的权势格局，以了解运动发生、发展的背景，以及运动相关议题与地方社会的交织关系。

论者普遍指出，江西五四运动阻力较小、发展相对顺利，但在督军态度、江右文化风气的普泛阐释外，更需要结合历时性维度、置身具体时空背景深入挖掘。就1917~1920年江西地方社会格局来看，军绅商学界内部情况相对复杂，亦形成了各自的运作策略。军界实权人物既要维系与地方商会、议会的合作，取得物资、人际联结方面的支持，又不得不顾及民生秩序、集体情感，以维持自己的社会认受性，并借助地方社会彼此的互动，实现对地方的控制。绅商界尚未形成某种单极格局，而是在传统的社会网络基础上，开始新的分合，不仅表现为派系、利益之争，也有对变动时局中话语的争夺。无论是商界、议会还是教育会，都与学生行动有密切交集，这些既有互动不自觉地某些侧面对五四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学界作为与新思潮距离最近的群体，表现出更多理想主义情怀和行动精神。在五四运动中，旧的议题如米谷禁运、救济浔路生发出了新的意义，江西学生界通过直接与京沪地区联动，发动抵制日货、罢课罢市等活动，将新的青年形象和时代课题呈现在江西地方社会面前。

五四运动也让既有社会积弊更赤裸裸地呈现出来。督军的微妙态度，根本上脱离不了军阀巨额消耗、财力资源不济、社会联结脆弱的逻辑限制；商会从初期支持转而消极抵制，乃至米运问题上与学界针锋相对；议会尚为自身稻粱谋，至此社会声誉已跌落难存；教育厅受重重限制、缺乏主动作为，这些都是江西五四运动中充满波折之处。旧的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，“进步”和“联合”何以延续？与袁玉冰类似的青年开始了深切的自省，在此后的发展中，新的联结和主体亦逐渐得以改造和创生。

(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1)

[责任编辑：侯竹青]

① 《南昌特别通信》，《时报》1920年4月26日，第5~6页。

② 《赣学生罢课问题之讨论》，《申报》1920年5月11日，第6页。

③ 《赣学生质问教育厅长书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6月11日，第6版。

④ 《赣人为学生力主公道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6月21日，第6版。

⑤ 《赣学生欲驱逐许寿裳》，《民国日报》1920年9月22日，第6版。

⑥ 《巴黎和会与北京政府的内外博弈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，第95页。